欧阳修集编年笺注（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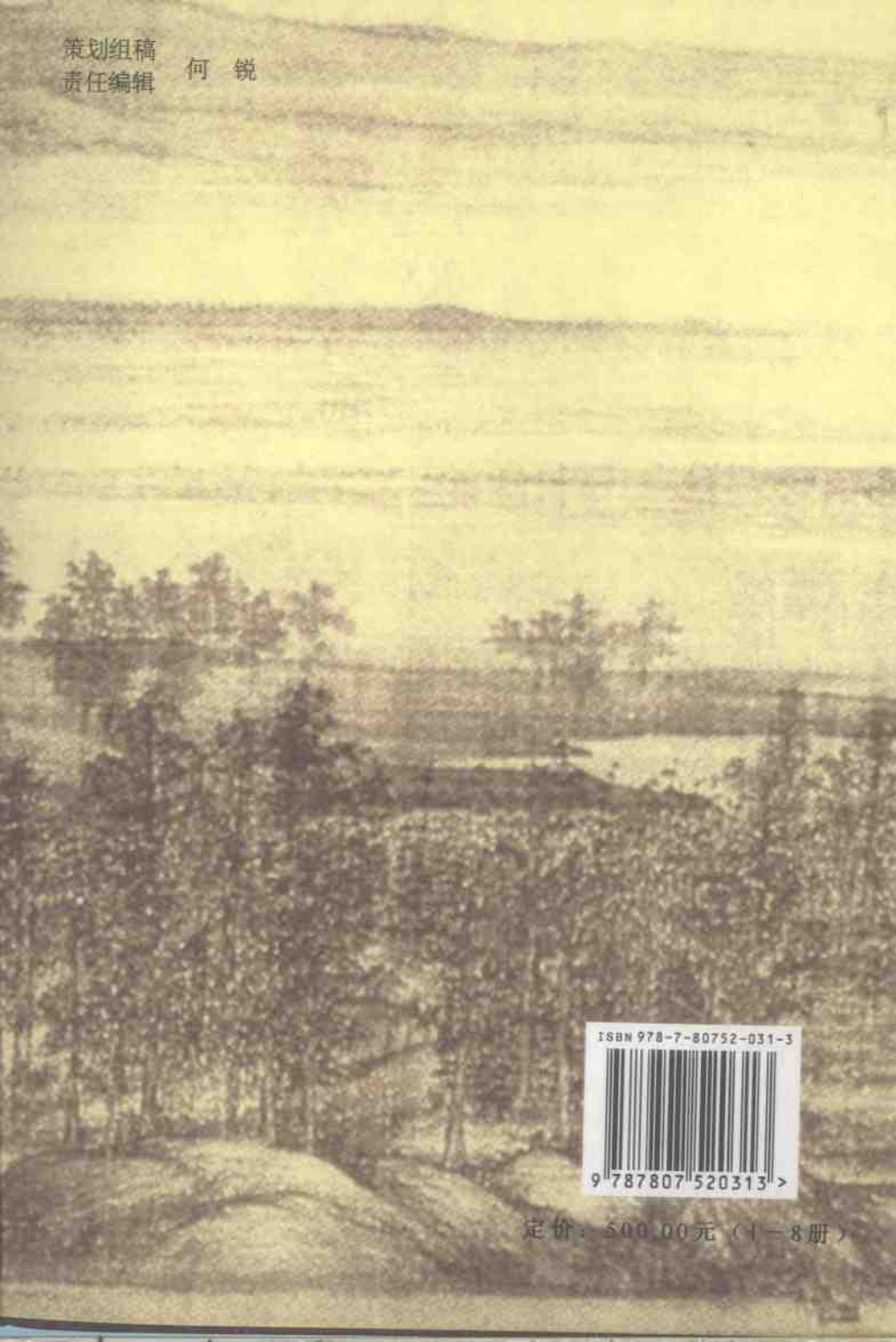
◆【宋】欧阳修 撰
◆李之亮 笺注

四川出版集团
巴蜀书社

宋学基础研究学术书

高安生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策划组稿
责任编辑　何　锐



ISBN 978-7-80752-031-3
9 787807 520313 >
定价：500.00元（1—8册）

欧陽修集编年笺注（一）



四川出版集团
巴蜀书社

前　言

大凡需要翻开此书的人，一定已对欧公其人其行有相当多的了解，因此再说些“欧阳修字永叔，吉州永丰人，生于某年，卒于某年，宋代文学旗手”之类的话，不但显得矫情多余，而且空占篇幅，浪费读者的宝贵时间。在这部《欧阳修集编年笺注》即将付梓前，我想说的只有两点，这两点都与欧公有关系，又不专就欧公而论，只是想借欧公这位文坛伟人说说对一千年前那个时代政治和文学的一些感想。

我要说的第一个问题，是欧公生活的时代大背景，包括政治背景和文化背景。所以要先说这个问题，是因为看到过个别论文，作者不甚了解宋朝是个什么样的朝代，只是就文学而论文学，分析宋人的诗歌有何特色，散文有何特色。这样的论文，更多注入的是研究者本人的好恶情感，脱离了产生这样或那样文学作品的土壤。要想把古人诗文的精华嚼出滋味，不了解那个时代的基本特征，是不大可能做到的，这正是前贤为什么要强调“文史不分家”的原因。在文和史两者中，文就如同地里长出的庄稼，史才是孕育诗文的土地，有什么样的土地，就长什么样的庄稼，

这是再浅显不过的道理。遗憾的是，我们现在不少的研究，还停留在只说庄稼不顾土地的层面上。看庄稼比较容易，拿在手里掂量一番，就能品评几句；看土地却很费力，需要花很多时间，走很多路，出很多汗，甚至脚底板要磨出血泡。然而只见庄稼不见土地毕竟是靠不住的。

那么欧公究竟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呢？在一般人的印象里，唐朝是个十分强盛的王朝，其实这仅仅说对了一半，因为从安史之乱开始，这个曾经强盛的王朝就开始大踏步地往下坡路上走，尽管唐肃宗费尽死力避免了亡国，武宗时有过一度小小的中兴，但军阀割据的势力越来越强，中央王朝渐渐失去了控制能力，这种局面一直持续了一百年，终于被宣武节度使朱全忠彻底摧垮，中国随之进入了一个更黑暗、更分裂、更贫困的五代十国时期。经过五十多年的动乱，赵匡胤才在一片废墟上建立了崭新的宋朝。所以用“崭新”这样一个词，是因为它不仅结束了一百五十多年的军阀混战、有枪便是草头王的混乱局面，更重要的是，这个军阀出身的帝王响亮地提出了以仁治国、以文治国的全新理念。从广义上说，宋朝是自汉朝以后真正实行文治的朝代；从比较的角度看，汉代的文治还很不彻底，应该说，除了汉景帝之外，其他汉代帝王的统治，并没有把“仁政”付诸实践。唐朝是个崇尚武功的朝代，从一建国，就烙上武人掌权的深深烙印，难怪会出现那么多谁都惹不起的大军阀，到最后国家就亡在这些军阀手里。在漫长的封建社会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中，孟子所谓“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的人本理念，几乎只在宋朝真正实现过。用现在的话说，中国历史上最重视“人权”的王朝，只有宋代。赵匡胤的治国理念，最根本的一条就是重视民命，以仁治国。他的仁治，和刘邦、李世民“与民休息”的权宜之计有着根本的不同，他是把民命真真切切放在心上的仁圣之君。从陈桥兵变到赵匡胤登基，只杀了一个誓死抵抗的韩通，汴梁城里市不易肆，如此平和的政权更迭，在中国历史上大概仅此一例。纵观宋朝三百多年，冤杀的志士君子只有靖康时的陈东、欧阳澈和绍兴时的岳飞父子等人，而且都发生在非常时期，出于非常之目的。谁还能找出比宋朝杀人更少的朝代？就连宋江那样的“草寇”，都采取招安的手段，一旦他投降朝廷，随后便委以官爵。这种事在其他朝代，几乎是不可想象的。在“仁”的前提之下，宋朝实行的是法治，这一点从真宗时期的《天圣编敕》、仁宗时期的《景祐编敕》、《嘉祐编敕》就能体会出来。所谓编敕文字，大部分是官员们在断案时遇到法典无据而申报朝廷裁决，由皇帝补充的带有指导意义的处置意见。宋代的朝廷大事，很少由皇帝一人说了算，绝大多数情况下，都采用集体讨论的方式决定下来。宋代官员的任命，采取举荐连坐的手段，不敢说没有“后门”的存在，但连坐这道绳索，对于举荐官员的人来说，无疑是一道紧箍咒，使他在举荐某人之前必须保持冷静、谨慎和克制。宋代的军队牢牢控制在文臣手里，连主管军队的最高长官枢密使和枢密副使，

都由文臣担任，武人在宋朝的地位相当低下，这一点与唐朝恰好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地方路分中的经略安抚使、转运使、提点刑狱官，绝大多数都是文臣，州郡中也采用文臣知州、府事的模式。所有这些政治体制，都保证了文人在宋代的崇高地位。在宋代帝王看来，文人执政不仅可以防止唐朝藩镇割据的可怕局面，还可以有效地保障仁政的推行，因为文人毕竟是些读过圣贤书的人，如何实行仁政，他们心里应该很清楚。尽管文人中也不乏把圣贤之书反过来读的，但那毕竟是少数。欧公生活的主要时期是仁宗时期，仁宗是当时和后世公认的最仁义的君主，其后的英宗、神宗，也都不是昏君。从这个意义上说，欧公是十分幸运的。这就是北宋前期的政治大背景。说这些与欧公有什么关系呢？当然有非常重要的关系：宋朝开创的前二十多年，还处在南征北讨的阶段，直到太宗太平兴国四年收复了北汉，国家才大体安静下来。在这个时期，太宗已经命文臣编纂《太平御览》、《太平广记》等大型类书。到了真宗景德年间，和契丹订立了澶渊之盟，国家进一步安定，文人的地位也随之进一步提高。当文人成为社会主体的时候，自然会出现为世人高度关注的文人群体。欧公中进士之后做的第一任官，就是担任河南留守钱惟演的幕僚。钱惟演在当时有文坛盟主之称，这就注定欧公从一开始就交上了幕府红莲的好运。众所周知，钱惟演是“西昆体”的代表人物，也就是说，如果欧公在钱氏的奖拔之下按照老路走下去，是不可能达到他后来那种境界的。更

值得庆幸的是，钱惟演幕下还聚集着尹洙、梅尧臣等有识之士，当这样一批人聚拢在一起时，彼此的人生志向和对文以载道的渴望，使他们很快产生了强烈的共鸣，这种共鸣，是基于他们对国家前途和命运的忧虑，他们需要用文章这种手段来参与广泛的社会变革。应该承认，对国家命运忧虑、用文章手段参与广泛社会变革的人不自欧公始，早在真宗时期，王禹偁就试图将文以载道的大旗打起来，其后的柳开、穆修也为此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可惜他们当时势单力薄，缺乏遥相呼应的合力，当然也就无法与占据文坛主流的杨亿、刘筠、钱惟演等人相抗衡。而欧公得以崭露头角，则是综合了许多有利因素。首先我们不能否认，这与钱惟演的提携奖拔是分不开的。以前不少人都把钱惟演和欧公判然划在两个对立的文学阵营，而忽略了二人在文学上的师承关系，那是不客观的，也是违背欧公本意的，因为欧公一生都没有忘记感激钱惟演，也从没说过钱惟演一句坏话，尽管二人对文章功能的认识并不相同。《四朝国史·欧阳修传》说："调西京推官。留守钱惟演器其材，不摧以政事，修以故益得尽力于学。"如此特殊的待遇，不是每个幕僚都能享受到的。正是由于有钱氏的倾力提携，欧公的文名才能在等辈中骤然鹊起。其次，文士相高，也不能不说是欧公文学地位提高的一大要素：欧公对尹洙、梅尧臣等人的揄扬固然增重了他们的声价，而尹洙、梅尧臣等人对欧公的揄扬，又反过来把欧公的文名推向更高。再加上欧公几位老丈人胥偃、杨大雅、

薛奎在士林中的广泛传播，自然形成了欧公名气日重的大势。现在我们就能体会到王禹偁、穆修那种单打独斗的方式，为什么不可能成为文坛领袖人物的原因了，这就叫“势”。任何事情，不借助“势”是很难成功的。对欧公来说更巧的一个“势”是：文坛霸主之一的刘筠在真宗末年先死了，杨亿在丁谓做宰相之后也莫名其妙地死了，钱惟演被刘太后从西京留守贬到随州，不久也郁郁而终。在这种形势下，羽翼丰满、蓄势待发的欧阳修接替他们登上文坛盟主的位置，也就不足为奇，甚至是顺理成章的事了。用现在的概念说，此时的欧公取得了“话语权”，这种后天的优势，与他本身具有的以天下苍生为己任的政治抱负结合起来，再加上他在官场上一往无前的大丈夫气概，使他在文坛上的崇高地位越来越巩固。以上这些属于“外势”，不过单有外势是远远不够的，更重要的是内因。我以为欧公之所以成为欧公，和他年轻时对前朝历史的辨析和思索是分不开的。人们在研究欧公文学成就的时候，往往会忽略他在史学上的贡献。他用了半生的精力写作《五代史》，写作《唐书》，也是成就他卓然大家必不可少的内因之一。人们常说“历史是现实的一面镜子”，那么对于欧公，唐朝和五代，不也是宋代的一面镜子吗？他在广袤丰厚的历史中徜徉和思考，对忠奸善恶、强弱进退以及何为国家民族利益、何为团体个人利益等问题的感知，当然要比普通人高出许多。对文人来说，有什么样的积累和境界，就能写出什么样的文章，这是只可意会而无法

用数据来统计和衡量的，这就是我为什么在前面喋喋不休总是强调大背景的用心。我们无须把欧公看成天生的神人，他少年时期的作品，比西昆还西昆，这是很自然的事。如果有人不信，看看他给胥偃等人的几封信就清楚了。可贵的是，当欧公一旦读到韩愈的文章，看到韩愈如何用文章作为武器，为自己的信仰高呼，为国计民生呐喊，向不合理的制度发起攻击和挑战，他便明白了应该选择的道路；与尹洙、梅尧臣等人的切磋，与范仲淹、富弼、杜衍等人的交往，更增强了他选择用文章作为载道行己之物的决心。同时也应该看到：欧公最终成为受人尊崇的文坛宗主，也是走过漫漫长路的，可以说，直到仁宗嘉祐二年他担任知贡举时，才确立了不可撼动的地位，因为他这一年的“话语权”是绝对的！说到这里，我想概括一下：第一，由于宋朝确立了文治国策，文人才有了受人尊敬的地位；文人占据了社会的主流，才有了文坛的盟主，而最早出现的盟主，必然扮演着“过渡”性质。杨亿、刘筠、钱惟演之流都是朝廷里的高官，且处在国家刚刚稳定的时期，要求他们把文学作品作为匕首和投枪，显得强人所难。欧公则不同，他进入仕途，恰好是国家稳定、国内矛盾日益凸显的时期，如何肃清吏治、如何富国强兵、如何克服国家稳定之后随之而来的种种弊端，便成为欧公等一批有社会责任心的士子思考的重要课题，于是他们的文章就容易有的放矢，切中时弊。欧公在知谏院时的一系列奏章和那篇激动人心的《朋党论》，把当世文章的导向一下子扭

动了一百八十度，他身边聚集的后进之辈越来越多，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力量，逐渐取代钱、刘而成为北宋文学的主流，甚至得到了最高统治者的肯定和赞扬。第二，文学革命需要旗手，也同样需要浩浩荡荡的生力军。既然赵匡胤顺应历史潮流，奠定了文人政治的基础，文坛旗手和巨匠的出现便成为必然，即使没有欧公，也会有其他人站出来扮演同样的角色。从这个意义上说，欧公是在一个良好的大背景下奋然挺出，举起了文学革命的大旗，正所谓时势造英雄，英雄造时势。说得再明白些，就是说宋朝的文学革命，实际上是一场群体性运动，是众星璀璨托起欧公一轮明月的局面，归根结底，还是不能忽略那个造就盛世文学的文治时代。因为欧公也好，王安石、苏轼也好，都是所谓庄稼，那个文治时代，才是孕育出成片好庄稼的丰饶土壤！

我要说的第二个问题，还是关于那个造就盛世文学的时代。这样的时代最起码要具备以下几个要素：一是有一大批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的有良心的士子，二是有一个让人说话的政治环境，三是有一个蔚成风气的文化氛围，四是有一大批高水平的文学作品面世。能够同时具备这四个要素的时代，在中国历史上鲜得一见，更多的文学巨匠，则属于单打独斗式，无法形成一种文学气候。比如战国时的屈原、魏晋时的陶渊明，乃至于唐代的韩愈，都是孤独无助的求索者，身边没有或很少有同道之人；他们所处的时代，要么是不让人讲话的时代，要么是无视人讲话的时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代，不具备形成强势和主流文化的土壤，自然也就不可能出现大批高质量的文学作品。宋代则不同，特别是在北宋，文治使士子们极大地增强了社会责任感和对自身生命价值的珍视，他们真正有了一种主人翁的感觉，而不再是暴力统治集团门前的花草，甚至在权贵门前讨饭吃的乞丐。有了这样的良好环境，士子内心的尊严和使命感便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升华，然后再将这些升华了的理想通过文章的形式释放出来，注入社会现实当中。这样的人多了，便形成了气候，占据了主流，便出现了一个盛世文学的时代。我之所以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复那个时代，是因为在中国历史上，这样的时代几乎只有宋代：统治者充满仁性，士子充满理性，他们共同把孔、孟的精髓发挥到极致。尽管二三百年间也出现过浊流和阴风，但这个文学盛世，是需要我们从根本上去开掘和研究的，这里所说的根本，还是指那个时代的人文大背景。对于宋朝的文学，不少人认为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是宋词，“唐诗宋词元曲”这样的顺口溜，几乎人人都知道，但我认为这是一种喧宾夺主的评价。宋词的来源是民间俚曲，唐朝时才得到士大夫的加工和改造，盛唐以前几乎没有这种文学形式，直到唐王朝衰落、士大夫意志消沉之后，词才在士子的交往中出现，晚唐时期渐多，五代十国时期，大盛于南唐和西蜀，中原士子还鲜有涉及。沿着这个脉络追寻，我们不难看出，这种文学形式在经过士子们的加工改造之后，连俚曲原本具有的清新色彩都被抹去许多，酒边案头、花街柳巷成了词

曲最集中的场所。从现存的宋词看，除了苏轼、辛弃疾等为数不多的豪放派词作之外，大多情绪低迷、格调绮靡，符合孔夫子定义的“郑卫之音”。这样的东西，很难作为一代文学的主流。宋代最有价值的文学，仍旧是载道而行的散文和诗歌。宋朝真正有为的宰相都很少写词，只有像晏殊那样的人，才拿写词当正经事干，难怪王安石瞧他不起：为宰相而沉溺于小词，这样的人要能把国家治理好才算见鬼呢！如果我们把《全宋词》、《全宋诗》和《全宋文》都翻开，不难发现，宋朝真正闪光耀眼的，还是那一篇篇浸透着仁人志士爱国情怀、充满着对社会对人生对科学深刻思索、对百姓对民族对国家命运焦虑、对经学勇于探求、言之有物、言之成理的优秀散文！宋诗作为散文的羽翼和附庸，也具有相同的特质。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宋代的诗文成就是群体性的、时代性的、高水准的。明朝有人编了一本《唐宋八大家文选》，这件事做得既好又不好。说它好，是因为编者总体的感觉不错：先秦之后的散文要数唐宋；唐宋的散文精华按比例切割，唐占四分之一，宋占四分之三，基本符合实际。说它不好，是因为他所选的宋代六大家给后人形成了一种局限和误导。首先，宋代散文巨擘绝不只六家；其次，他选择的态度上带有明显的门户之见：三苏、曾巩、王安石都是欧门弟子，独立于欧门之外未经欧公揄扬的人，一个也没能进入他框定的“大家”行列，这很显然有失公允。后学之人不明就里，沿着这个框架去读书，去研究，其结果是把目光都集中在

了这几个人身上；再说这所谓的“六大家”果真是宋朝散文成就最高的代表人物吗？恐怕也很值得商榷。我们是否可以提出这样两个疑问：一、宋朝的散文，编者都细细读过吗？二、确定一位作者是否大家的标准究竟是什么？如果我们没有更多的时间去阅读宋人的原著，不妨翻开《四库全书总目》，看看清人的提要，或许能给我们不小的启发。该书卷一五二田锡《咸平集》提要云：“当时已重其言，故其没也，范仲淹作墓志，司马光作神道碑，而苏轼序其奏议，亦比之贾谊。”同卷韩琦《安阳集》提要云：“其辞气典重，敷陈剴切，有垂绅缙笏之风。”尹洙《河南集》提要云：“所为文章，古峭劲洁，继柳开、穆修之后，一挽五季浮靡之习，尤卓然可以自传。”范仲淹《文正集》提要云：“贯通经术，明达政体。”苏颂《苏魏公集》提要云：“平生嗜学，自书契以来，经史九流百家之说，无所不通，发之于文，亦多清丽雄赡，卓然可为典则。”司马光《传家集》提要云：“光大儒名臣，不以词章为重，然即以文论，其气象亦包括诸家，凌跨一代。”卷一五二刘敞《公是集》提要云：“合众美为己用，超伦类而独得。”限于篇幅，不再一一列举，像宋祁、刘攽、沈遘、韦骧、吕陶、文彦博、张方平等文集提要中，无不啧啧赞美之辞，这正是我上面说到的“群体”现象。可惜由于《唐宋八大家文选》的影响，后人大多把目光集中在那几个人身上，忽略了对其他大家作品的研究。我始终认为北宋散文卓然千古，至今无法企及，属于一个时代现象，

而不属于个别现象。如果我的感觉与史实相去不远，那么我们对宋代散文的研究是否可以再开阔一些，再全面一些，再客观一些？比如在所谓宋代六大家中，曾巩的文章真称得上是“大家”吗？如果连那样细弱的文气都能叫做“大家”，那么王禹偁、司马光、韩琦、宋祁等人，岂不应该列在“特家”之列？就个人情感而言，我非常喜欢欧公的散文，也非常赞赏荆公的散文，但这并不排除我同样喜欢其他许多宋人的散文，所以除了注释欧公、荆公的文集之外，我又作过《安阳集》的笺注，还将作司马温公集的笺注。如此劳累，就是希望让更多的宋人佳作能以更易读懂的形式出现在读者面前。

再回到这部《欧阳修集编年笺注》上说几句：本书采用的底本是四部丛刊影印元刊本，参考了四库全书本、庆元二年周必大编刻本和清嘉庆二十四年欧阳衡刻本。校勘方面没有更多可说的，因为底本和周必大本已经作得十分到位，甚至到了让人感到过于细碎的地步，连“也”、“矣”、“焉”、“乎”之类的语助异体字都不厌其烦地罗列出来。其后的明清刻本，大都依据这两个本子，所以没有必要徒增麻烦。只有欧阳衡刻本，与周本不属于同一系统，文字和篇目也稍有不同，在校勘中，予以酌采。其欧阳衡本多出的数篇文章，都放在最后的逸文补编中。本书用力最多的还是笺注部分，由于欧公淹贯经史子集，一般人根本不可能达到那么高的境界，所以尽管费尽心力，还是有些典故无从考索。编年的部分，周本已经做了许多工

作，对于没有疑义的篇章，编年一仍其旧，但在笺注过程中，也发现数篇诗文的原注年月有些谬误，凡属此类，均予以重新系年，并说明缘由根据。本书还收录了一些与欧公诗文有关的他人文字，统统放在“附载”一栏中，以备读者取舍，庶免翻检之劳。需要说明的是：附载部分的收录不可能穷尽，一是本人见闻有限，二是有些文字没有太大的参考价值，或是重复叠沓，这类文字就不再收录了。佚文的收集，问题较大的是词的部分。由于欧公本人并没有把这些作品看在眼里，所以在他手编的《居士集》里一首也没收录。现在能见到的欧公词有两大系统，一是《欧阳文忠公集》里收录的三卷，二是南宋时人编的《醉翁琴曲外编》六卷。《四库全书·六一词》提要引曾慥《乐府雅词序》云：“欧公一代儒宗，风流自命，词章窈眇，世所矜式。乃小人或作艳曲，谬为公词。”又蔡絛《西清诗话》云：“欧阳修之浅近者，谓是刘煇伪作。”显然，现在署名为欧公的词，有相当一部分并不是出于欧公之手，但因无法判断，只能悉数附在书后。读者阅读时，留些心就是了，不必全信。还有一个问题：底本原编是一百五十三卷，其中第八十一卷后面有《外制拾遗》一部分，附在卷后。本书在编纂时考虑到它的独立性，将这一部分移出，另编为一卷，厘次为八十二卷。这样一来，此下的七十余卷就和原本卷次不相符合，也就是说，原本的第八十二卷，在本书中编为第八十三卷，以下依此序类推，最后以一百五十四卷告结。除此之外，都是按照底本顺

序编排的。

关于本书的笺注，还有几点需要向读者交代。一是笺注文字的取舍。为了让读者尽量减少翻检之劳，有些重复使用的典故和史实，大都分别在相关条目下作了注释，而很少采取以前通行的“见某某卷某某诗注”的形式，因为那样做虽然节省了一点篇幅，却给读者带来不小的麻烦，来回翻阅，甚至会影响读书的情绪。二是注释中的引文部分，尤其是比较长的引文，大都作了一些删节处理。为了保持眉目清晰，这些删节之处，不再加“……”号，这样做不会影响到一般性的阅读和参考，但读者如果需要引用这些文字时，最好核对原文之后再行取用。三是引用史书时，除了《宋史》、《辽史》、新旧《唐书》列传统统注明“卷若干”之外，其余《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等，一般只注明“某书某某传”，如《史记·伯夷列传》、《汉书·贾谊传》。这是因为《宋史》、《唐书》卷帙浩繁，查找一个人很不容易，将卷数写明，会给读者一个明晰的概念，而前几史部头都不算太大，加之前人注解也有约定俗成的格式，所以依旧从众。其余一些笔记、杂史、政书等，则一一注明卷数。这些书的作者和所处的朝代，读者很熟悉的不再注明，可能不太熟悉的，大都列了出来，如“陶渊明”，就无须再说“晋陶渊明”；而《荆楚岁时记》，则注明“南朝梁宗懔《荆楚岁时记》”。四是本书中涉及很多宋朝人物的仕履，有些地方注明“参拙撰《宋代郡守通考》”、“参拙撰《宋代京朝官通考》”、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